

· 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 ·

比较新闻学： 方法与考证（修订版）

张威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 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 ·

比较新闻学： 方法与考证（修订版）

张威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国内中西比较新闻学领域中与国际研究接轨的首部考证型专著。它在大文化研究的框架下对西方和中国的新闻学诸范畴做出了翔实的考察,重点探讨了比较新闻学的定义、历史沿革、研究现状和展望。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对中西新闻理论异同的宏观考察,下篇是根据大量的新闻实践和案例比照上部的理论进行诠释。全书信息丰富、旁征博引,重视第一手资料,流畅易读。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张威著.一修订版.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

ISBN 978-7-302-34379-0

I. ①比… II. ①张… III. ①比较新闻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0148 号

责任编辑:纪海虹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宋玉莲

责任印制:刘海龙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装 订 者: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mm×235mm 印 张:22.25 字 数:44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600

定 价:46.00 元

产品编号:054172-01

自序

对“西方”概念的诠释

本著作中的比较新闻学是指在中国和西方框架下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的综合比较研究：在本质上，它是一项东方与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跨文化研究。

文化意义上的“西方”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随着历史的演进，它的地理意义早已模糊了，而它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却日益凸显出来。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建立，这个概念的意义已经稳定建立在以欧美资本主义模式和价值观念为代表的文化这样一个层面上。20世纪后期，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西方”概念的这种抽象就稳固下来。有一种意见认为，西方文化就是希腊、罗马的传统加上后来整合进去的基督传统，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而在近几百年来大盛于西欧、北美的文化系统。^①

然而，“西方”这个概念又是具体的。仔细分析一下，英国文化并不等于美国文化，意大利文化不等于法国文化。德国当代传媒研究者霍夫曼认为，客观主义这个概念，德国有德国的看法，英国有英国的见解，挪威有挪威的诠释，其中的差别还是比较显著的。^②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断定：英国、美国、德国、挪威等国家同属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是由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趋同性所决定的。从英国嫡出的澳大利亚尽管地理位置不在西方，但它的文化传统、精神气质、政治经济方面完全属于西方世界，是和西方文明一脉相承的。事

① 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66页，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

② See John Martin and Anju Grover Chaudhary (eds.), Comparative Mass Media Systems, London: Longman Inc., 1985.

实上，西方所有的成员国都是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正是这些环节组成了整个西方链条。

人们习惯上的思维定式是：美国=西方，西方=美国，其实这是相当不严谨的。西方文化的主要来源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没有一个是美国的产品。尽管美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地位使其足以充任当代西方的典型代表，但美国还是无法取代西方世界的其他国家。而且，美国的极端膨胀、激进都使其具有特异另类之嫌。相对来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却有着相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稳定性。

本著作中的西方是指以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文化为主流的、使用英语的资本主义“文化西方”，它一般不包括非英语的西方国家。做这样的界定主要是因为，由于语言隔膜的问题，本著作没有涉及非英语西方国家的第一手信息资料，这些国家包括德国、日本、法国、挪威、瑞典、意大利等。近年来，一些比较新闻学研究动辄使用“中西”的巨大标题，但那“西”的盛名之下却藏着几分暧昧。有的中西研究的“西”，内容实际只涉及美国一家，还不如干脆叫“中美比较新闻学研究”来得明白。正如美国华裔学者许倬云指出的：

中国人讨论西方文化时，常常笼统统统以“西方”二字概括一切，忽略了欧美地区文化内涵的复杂性，也无视于西方世界在近百年来本身经历的种种变化。^①

在本著作中的澳大利亚新闻学是作为西方新闻学比较坐标之一出现的，这样做并非出于偶然。作者长期在澳洲从事澳大利亚报刊研究，涉足其新闻媒体，对研究对象有着较直接、较系统的体验。作者希望第一手的资料和经验有助于本研究的鲜活和精确。

新闻学危机

重现新闻学的内在价值是本书的一个目的。

21 世纪伊始，许多人痛感新闻学危机。

新闻学是什么？传播学又是什么？它们之间有何种联系和区别？在新媒体时代，当新闻(Journalism)变成传媒(Media)之后，一些学者认为，它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存在理由，新闻已经不再是探讨人的社会实践，而变成了另一种哗众取宠的商品。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卡莱(James W. Carey)认为美国新闻教育多有可指摘之处，其错误就在于将新闻视为传媒。卡莱在其论文《新闻教育错在何处？》中提出三个原则：1. 新闻或新闻教育不能和广告、传媒、公关或广播视为一体；2. 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实践，新闻不能和媒体及传播混淆；3. 新闻是民主的另一个名字——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②卡莱认为，新闻教育本应该属于人文学科或有人文味的社会学科，而不是科技；新闻的主要对象是人和其社会环境，而传媒至多只不过是一种传达意义的工具、科技、组织结构，如果把新闻当作

① 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205 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② 李欧梵：《新闻危机》，载《21 世纪环球报》，2002-06-14。

传媒,就等于“把鱼的故事和鱼”混为一谈。学者李欧梵指出,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是以市场为出发点的,所以报纸的销量和电视的收视率成为媒体关注的目标,而不是社会和人生。李欧梵认为,目前要廓清几个问题:新闻到底是什么?它在社会领域的角色和地位是什么?新闻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否尊重新闻?新闻和媒体的关系是什么?新闻媒体的急速转变——从印刷转向视觉网络造成了广泛的人文危机。发掘新闻学的内在价值是本书的一个目的。^①

最近 10 多年来,随着传播学被引进到中国,新闻学被忽视了。对时髦的传播学,一大批学者趋之若鹜,研究新闻学似乎成了件落伍的事情。人们甚至还没有完全读懂它就准备弃之而去。但是,新闻学的独立价值是不会被埋没的。正如美国《纽约时报》前总编基恩·罗伯特所言:

人文学科,如文学和历史是新闻学的天然伙伴,更贴近新闻实践和媒体实践。而从社会科学派生出来的分支学科——传播学对新闻实践没有密切联系和实际意义。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聚合”或新闻学“陷进”传播学,制约了新闻学价值的张扬和个性的发展。^②

和基恩有同感的美国学者不在少数,他们认为,新闻传播学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陷阱里,或掉进应用传播学金钱的陷阱里,二者都走进了一个远离新闻学真谛的真空世界。有人甚至认为,新闻毕业生质量的下降应归罪于“大众传媒理论课程”和教员中拥有传播学博士学位人数的增加。新闻的核心价值和职业道德是新闻工作者从业的基础……由于大学教育中对传播学的强化和对新闻学的弱化,新闻的核心价值正在受到损害。^③

在 21 世纪之初,一些中国学者试图重建新闻学价值,他们呼吁人们要学习和研究新闻学的精髓——系统地收集分析和传播信息的能力,讲求新闻的真实性、公正性、全面性以及新闻的专业经验。一些新闻学教授认为,由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混淆,新闻学教育正在失去灵魂,因为在某些院系,新闻学的核心课程正在沦为选修课。然而,新闻学和传播学在培养人的方向上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为社会和公众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无冕之王”,而后者是为各种利益集团服务的。^④

其实何止是新闻学,近 10 年来,整个教育界都表现出一种失重现象。韩德强博士在他的反潮流著作《碰撞》中坦率地指出,中国的教育在某些方面是失败的,这种失败首先表现在学生对核心科技知识的冷落上。韩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初,社会上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后来热点又转向管理、财会、外贸、法律、计算机、外语类专业,几

① 李欧梵:《新闻危机》,载《21 世纪环球报道》,2002-06-14。

② 李希光:《新闻学核心》,73 页,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

③ 李希光:《新闻学核心》,77 页,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

④ 李希光:《新闻学核心》,69 页,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

乎所有的硕士、博士入门考试似乎主要是在考外语，水利、地质、农林、机械、材料、物理、数学等最需要一流智力和创造力的专业常常只能招到中下等生源。^①但是，在人类科技进程中的决定因素还是数、理、化这些基本学科。这个道理对新闻传播学同样适用，此间并无贬低人们对传播学的热情之意，但新闻学是基础、是源泉则是毋庸置疑的。本书以一些传统新闻学的基本课题为论题，其中包括新闻理念、新闻报道方式、新闻属性等，这实际是对重建新闻学价值的一种呼应和积极支持。与此同时，新闻学的派生专题，如新闻道德、新闻法律等在本书中没有专门论及。

本著作的构架和方法的侧重

本书以引言“比较与交流：中国的两次革命”开篇，其中主要是从中西交流史的角度审视文化比较在文明发展中、特别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意为为全书提供一个宏大的背景和坚实的基础。长期以来，这个背景被一些中西比较新闻学学者们所忽视，由于没有文化的底蕴，两种新闻的比较就不能摆脱苍白、单薄、脆弱的毛病。引言展示了文化比较在东西方文明相互交流中的历史作用，将文化比较提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力杠杆”这一高度，以期引起人们对文化比较的足够重视。

上篇“比较新闻学的宏观视野”

第一章的主题是讨论比较新闻学的方法论，是对这门新兴学科的概念、界定、范畴、特征等方面的系统叙述和诠释。比较新闻学是一门尚在发展的、年轻脆弱的新闻边缘学科，到目前为止，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中国还是澳大利亚，比较新闻学都还没有总结出属于自己的稳定的术语、概念、范畴和方法，而这些恰恰是一个学科得以建立的标志。本研究试图填补这个空白。在方法论上，作者在肯定传统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科际整合等方法对比较新闻学发生极大作用的同时，对历史的、文化的、理论辨析的、对话的、个案研究的范畴加以诠释，认为它们已成为比较新闻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因此，本章的讨论具有构建和完善学科的重大意义。

中国比较文学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端，经过改良派严复、梁启超等人引进西学，新文学运动健将胡适、李大钊等人人为之鼓吹，王国维、鲁迅、茅盾、吴宓、朱光潜等人的鼎力助威而一度发展迅速，但在1949年后却陷入万马齐喑的局面。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国际“冷战”终结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突然异峰突起，涌现出三次浪潮：“文革”之后，以钱钟书、杨周翰、季羡林、李赋宁为首的学者是比较文学复兴后的首批开拓者，随后乐黛云、钱中文、饶芃子、陈淳等专家又形成了第二梯队，近年来，更年轻的学人辈出，正是这三

^① 韩德强：《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263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个梯队,将中国比较文学推上了世界舞台。比较文学在我国大学中已经建立了从硕士到博士的完整学术体系;研究者们撰写的学术著作内容已经几乎涵盖比较文学学科的所有层面,突破了“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樊篱,显示出以中国文化为教养的文化精神和方法论特征。此外,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积极参加国际比较文学的重大活动,已经进入了与国际学术对话的行列。^①所有这些都对中国的比较新闻学界具有启迪和示范作用。

引进比较文学方法论以加快比较新闻学研究步伐基于这样一个依据:“比较文学的原理和比较、综合的方法也适用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对人文科学来说,尤其重要。”^②本章明确将比较新闻学置放在跨文化研究的范围内,强调比较新闻学对比较文学方法论的借鉴,从而开拓了一个新视野,突破了传统比较新闻学多年来徘徊不前的凝滞局面。

第二章“比较新闻学的历史、现状与难题”主要针对中西比较新闻学的发展脉络进行历史梳理。本章追溯了自20世纪初从西方发端的比较新闻学的萌芽,沿着时间的路径平行回顾了西方和中国比较新闻学的发展,评点了该领域中一些值得注意的理论著述,提出之所以比较新闻学多年来停滞不前、毫无生气,原因就在于学术问题意识形态化、东西方彼此之间做了简单化的观照。本章还分析了文化相对主义、西方中心论、妖魔化等思潮,提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东西方比较新闻学要破除敌意,平等对话,互识互补,走和而不同的道路。

第三章“比较新闻学与文化误读”是对阻碍比较新闻学正常发展的文化误读做进一步剖析。误读(Misunderstand)是认知活动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这里指一种文化在解析另一种文化时出现的错误理解和评估。误读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不同的意识形态、相异的文化背景或粗疏都可能是造成误读的原因。误读的后果为远离事物的本来面目,堕入谬误泥沼,误读在大众传播中的消极性是显而易见的——误报、妄加评估、在新闻报道中的主观介入以及对事实的歪曲会加深不同文化之间的鸿沟。避免误读是促进两种文化进行正常交流的必要条件,它要求人们以一种富于理解的心态,详尽地占有事实,准确地进行分析。这些对比较新闻学都有提示的作用。

第四章“比较新闻学的社会因素”探讨政治和文化是如何影响新闻风貌的。在中西新闻比较时,如果简单地将两种新闻现象放在一起衡量,得出结论,就可能会误入歧途;离开了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的基础去侈谈客观性、新闻自由、真实性、舆论监督等概念就无异于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政治和文化原本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题目,本章的讨论不在于求全,而在于提供一些可资参照的视角。本章中的政治因素是指政治制度赋予新闻形式的某种规定性;本章中的文化因素是指文化传统对新闻形式的某种渗透和影响。一定社会制度下的政治和文化

① 严绍璦:《中国比较文学的现状与未来》,载《中华读书报》,2000-05-10。

② 李赋宁:“序”,见乐黛云等:《比较文学原理新编》,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决定一定的新闻观念、样式、内容和风貌，对政治和文化的因素进行鉴别在比较新闻学中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本书的下篇“比较新闻学的聚像关注”着重讨论中西新闻理论和实践的趋同性、交叉性与悖逆性。在新闻概念的某些理论方面，双方具有一定的趋同性，比如新闻的定义、新闻价值以及新闻的功能。然而，在实际运作方面，中西新闻之间的悖逆性却是普遍的、巨大的，具体表现在双方相似的理论申明和不同的实践以及双方不同的理论申明和不同的实践上。在中西新闻理论方面历来有一些纠缠不清、似是而非的问题，本篇的重点就在于廓清这些问题。

在一个世纪的洗礼中，中西新闻理论经过了多次碰撞和磨合，到 20 世纪 90 年代，在一些基本概念方面显示出一种融合的趋势。从源和流的关系来看，西方新闻学研究在先，中国新闻学研究在后，考察这些基本概念的冲突、融合与变异是比较新闻学研究的出发点之一。第五章“‘新闻’作为一种概念”讨论了中西双方在新闻、新闻价值、新闻的功能诸方面的趋同性。第六章“信息流动：怎样面对挑战”着重检视了中西双方都趋向一致的新闻最重要的功能——“告知”(inform)在实践中的变异和三大障碍。第七章“媒介威权与引导舆论”探讨的是媒介影响研究问题，通过实例透视两个世界中的媒体如何对受众释放影响。第八章“客观性、阶级性和宣传”试图诠释中西在新闻理论属性方面重大的原则分歧，虽然这些话题都是老生常谈、耳熟能详，但由于它们的重大性和人们对其理解的纷乱，仍然有必要做进一步梳理。

从第九章起进入新闻实务研究，其中包括第九章“硬新闻和软新闻的界定及其依据”、第十章“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第十一章“典型报道：中国当代新闻业的独特景观”、第十二章“调查性报道的沉浮”等专题。本部分不仅显示了中西之间在新闻实践方面的不同，而且从较深的层面上发掘了形成二者不同风格的原因。作为正面报道最高形式的典型报道是中国新闻的独特景观，但在西方新闻报道中，它是一种缺失的样式。它为什么在西方缺失？它怎样在中国兴起、发展和衰落？它未来的命运如何？本部分都作出了解答。本部分还讨论了负面报道的最高形式——调查性报道在西方与中国的历史命运。作为一种新闻报道样式，调查性报道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含义，它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西方兴起，至今仍然如火如荼并领导着西方新闻报道的潮流。调查性报道在中国一直命运不济，但在 20 世纪后期直至现在却几次异军突起。中西调查性报道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是本部分考察的重点。

本著作选择报业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因为报纸是起源最早的新闻媒介，也因为报纸比电视、广播、网络更具有稳定性和记录性。报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进入了非常成熟的时期，它的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已经昭显得异常清晰。国际比较新闻界多以报纸为比较对象，也是考虑到报纸的相对稳定性。在西方，报纸、广播、电视之间的所有权是有区

别的。报纸是受官方限制最少的媒体,对广播、电视或其他电子媒介,政府是有所控制的。应当指出的是,报业发展的原理对其他形式的媒体来说也是通用的。

本书选择的一些比较话题特别注重对那些似是而非问题的廓清,不求笼统、囊括一切,但求精当、有的放矢。在方法上,本著作的着眼点不仅注重展示理论是怎样说的,而且注重检视媒体实际是怎样运作的,尤其注意揭示一种异化的规律,比如,尽管新闻自由是西方思想家首先提出来的,是西方媒体奉为神明的宗旨,但当代的西方媒体却不由自主地陷入了一种垄断即限制新闻自由的怪圈;再比如,尽管中国的土壤本质上并非产生调查性报道的沃土,然而,这种发端于美国的新闻报道形式却在新世纪之交的中国发展得势头迅猛。新闻中的异化是作为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趋势进入本书视野的。

简单的比附是本书力求摆脱的。中西新闻学之间虽有极大的区别,但其中的联系却也是千丝万缕。本书主要聚焦中西新闻学的主流观点,并将它们作为分析、实证的样本,但同时也注意到双方一些非主流的、具有批判性的观点。比如,一般来说,当代西方报业主流否认新闻的阶级性、推崇报道的客观性,但一些西方媒体批评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左翼批评家却一直试图揭示新闻的阶级性、质疑新闻的客观性。一般来说,西方新闻学中的客观性是遭到中国主流媒体贬斥的,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新生代学者却不断诠释客观性,为其申辩,将其当作新闻专业主义(Professional Journalism)的一个明显标志。这种复杂的非单一性的情况在本书中得到了关注。

本书力图将迟滞的比较新闻学推进到一个新境界,即跨文化研究的境界。所谓的“新”也大抵是构建在这个意义上的。

本书在方法论上强调原典性研究,即展示 Original Evidence。这种在西方学术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方法,其基础之一就是分析、证明时要援引原始材料,而尽量不使用二手资料;引用时避免断章取义、曲解和各取所需的情况发生。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者严绍璁教授是原典性研究的热心提倡者。他提出了原典性研究的五个层次,其中首先强调“确证相互关系的材料的原典性”原则。该原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作为研究的材料,对研究的客体(对象)来说必须具有‘原典性’。一是指作为‘研究的材料’必须是本国或本民族的材料,即作为论证中具有主体意识的材料必须是母语文本材料”。^①

将比较新闻学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是本书的追求。但由于种种原因,书中的分析还远未到位,这倒是作者事先就预测到的。一个人的思想和表达往往难以突破时代与社会的框框。报人范敬宜推崇京剧艺术家盖叫天的功夫,说他到了晚年,仍然可以在一张八仙桌下打完一套猴拳而不碰桌子腿,可谓是炉火纯青。^②那就让我们从盖叫天身上多汲取一

① 严绍璁:《“原典性的实证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见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编:《多边文化研究》,64~65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

② 刘鉴强:《如果有来世,还是做记者——范敬宜当新闻记者的修养》,载《新闻记者》,2002(6)。

些营养吧。我们毕竟处在一个前进的时代。本书中的一些遗憾当有后来者弥补。

写作本书的契机和致谢

本书的写作契机可以追溯到1986年，当时，作者作为英语新闻周刊《北京周报》的一名记者，正在新华社“汤姆森基金会——国际英语新闻写作中心”接受训练。执教的老师多为英国路透社的资深记者。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稿子曾经得到过老师的好评，那些作为范例的英语新闻使我着迷，并激发起我对新闻理论的探询。若干年后，我得以在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攻读新闻学，由于我的中国背景，我的主任导师（Principal Supervisor）、澳大利亚著名新闻史专家科萨斯（Professor Ann Curthoys）教授鼓励我做比较新闻学研究，我就这样走上了比较新闻学之路。我先后有两部比较新闻学的英文著作问世，其中一部是博士论文，反响还不错，于是，当我回国之后，我就试图撰写一部中文的比较新闻学著作。所以，我首先要感谢的就是我当年的主任导师、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传媒与历史研究系主任的科萨斯教授。

我的第二导师、国际著名汉学家、悉尼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梅葆·砾教授（Professor Mabel Lee）也是我要感谢的一位学者，她是我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时期的主任导师，也是我开始研究西方社会科学的首位领路人。她的严格要求使我一踏上治学之路就站在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我对她的教诲至今不敢忘却，是她强有力的推荐使我能够在众多竞争者中获取奖学金，从而使我的博士研究成为可能。我的第三导师汉缪顿教授（Professor Paula Hamilton）对我在西方传播理论和澳大利亚报刊史方面的指导也使我受益终生，我对她抱有同样的感激。

15年前，当我的博士论文付梓时，我在扉页上写道：“此书献给我的儿子 Yi，因为这本书，父亲不得不丢下儿子，在大洋彼岸苦读”，我离开 Yi 时，他才两岁，我对儿子深表歉意；5年后，当此书初版时，儿子已经长大了，但我还是要对他深表歉意，因为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多。看来，一名学者，一旦踏上了“贼船”是很难回头的。此外的启示是，一名西方学者很少会陷入我辈这种境地，多年浪迹天涯的实践表明，一名中国学者哪怕是想做出一点微小的探索都要付出太多的艰辛，有时甚至是牺牲亲情，也许，当我们还没有动手做中西文化比较时，比较就已经开始了。

但我欣喜地看到，在21世纪，东风已在与西风融合与较量中越来越强劲。

张 威

2002年9月初稿于南京大学

2013年7月修订于山东大学（威海）

目 录

自序 I

引言 比较与交流：中国的两次革命 1

- 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平衡 1
- 二、文化比较：中国的第一次革命(1840—1920) 12
- 三、文化比较：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78—) 15

上篇 比较新闻学的宏观视野——方法、难题及其他因素

第一章 比较新闻学的界定、依据和研究方法 23

- 一、关于界定 23
- 二、比较新闻学学科产生的条件 26
- 三、比较新闻学的可比性问题 29
- 四、比什么？怎么比？——比较新闻学的内容和一般方法 ... 34
- 五、比较新闻学学者应具备的素质 42

第二章 比较新闻学的历史、现状与难题 46

- 一、中西百年比较新闻学发展回顾 46
- 二、比较的难题之一：意识形态阴影下的学术领域 50
- 三、比较的难题之二：简单化倾向 54
- 四、比较的难题之三：西方中心论与妖魔化中国 59
- 本章小结 63

第三章 比较新闻学与文化误读 64

一、误读是文化交流中的普遍现象	64
二、两种误读方式	67
三、中美记者眼中的新闻理念	75
本章小结	80

第四章 比较新闻学的社会因素 81

一、政治因素在比较新闻学中的意义	81
二、文化传统在比较新闻学中的意义	91
本章小结	102

下篇 比较新闻学的聚像关注——中西新闻理论和实践的趋同与悖逆

第五章 “新闻”作为一种概念 107

一、划分世界传媒体系	107
二、“新闻”是什么	111
三、“新闻价值”：理论同一与实践悖谬	117
四、新闻的社会功能	121
本章小结	128

第六章 信息流动：怎样面对挑战 129

一、为信息自由流动而斗争的实践	129
二、“完全信息”和“全面告知”	131
三、对“全面告知”的挑战	133
四、影响信息流动的因素之一：权力	134
五、影响信息流动的因素之二：媒体决策者	147
六、影响信息流动的因素之三：自我审查	155
本章小结	160

第七章 媒介威权与引导舆论 161

一、谁在设置议程	161
二、舆论监督与“守望犬”(Watch Dog)	164
三、关于中国舆论监督的定义	167
四、引导舆论与说服(Persuasion)	171
五、公开引导和潜在引导	175
六、个案研究	182
本章小结	185

第八章 客观性、阶级性和宣传 187

一、客观性与阶级性的相互缠绕	187
二、多重理解	190
三、客观报道与中国	195
四、仅仅是一个“不死的神”	197
五、客观性与国家利益	200
六、宣传：褒还是贬	202
本章小结	204

第九章 硬新闻与软新闻的界定及其依据 205

一、硬新闻与软新闻的区分	205
二、理论误区	207
三、误区探源	209
四、硬新闻和软新闻的界定及其依据	212
本章小结	221

第十章 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 222

一、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的特点	222
二、负面报道的普世性	225
三、一般报道	225

四、负面报道的理论依据和实践	226
五、负面报道的中国脉络	233
六、正面报道的理论依据和实践	235
七、社会问题：中国报道的新视点	242
本章小结	244

第十一章 典型报道：中国当代新闻业的独特景观 246

一、文献研究	246
二、渊源和苏联的实践	248
三、中国的典型报道：源起和膨胀	251
四、典型报道的实质	255
五、典型报道的特征	258
六、典型报道产生的土壤	263
七、典型报道的式微和某些新趋势	265
本章小结	269

第十二章 调查性报道的沉浮 270

一、黑幕揭发运动——调查性报道的先声	271
二、调查性报道异峰突起	273
三、调查性报道的狭义和广义	283
四、中国：艰难的起步	286
五、调查性报道的软着陆	288
六、中国调查性报道的杰出实践者	291
七、挑战与机遇	301
本章小结	316

结论	321
----------	-----

后记	323
----------	-----

主要参考文献	325
--------------	-----

比较与交流：中国的两次革命

世界到了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民族的发展是和比较、交流紧密相连的，或者更严格地说，当人类进入诸文明并存的时代，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对他民族的比较与交流——这是因为，比较乃一切认知的基础，而文化交流则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

比较新闻学首先是一种跨文化研究，考察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趋势对于全面了解比较新闻学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一代宗师季羨林在解析比较文学时说：

文学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讲比较文学而不讲比较文化，无论如何也是十分困难的。我个人甚至认为，离开了对中西文化异同的探讨，而侈谈比较文学，必然搔不到痒处，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必然会南辕而北辙。不管你用的话语多么摩登，不管你引用了多少外国流行的主义，都无济于事的。也决不会促使比较文学这个学科前进。^①

季先生认为，文学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据此观点延伸观察，会发现新闻学亦乃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离开了文化侈谈比较新闻学，对许多问题也同样解释不清。所以，我们的比较新闻学要从比较文化开始，从中西文化交流的源与流谈起。

综观中西交流的历史，我们首先会发现一种巨大的失重。

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平衡

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历史上早就有过互相探奇、互通有无的举动。汉代（公元前138年），张骞有西域之旅；东晋（公元339年）法显曾游学西土；唐

^① 季羨林：“序”，见乐黛云等：《比较文学原理新编》，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代(公元629年)玄奘开赴西天取经；公元753年鉴真东渡日本传经……不过，上述中国人所到之处均未超出今亚洲地域，所谓西域、西土、西天不过是今日中国的近邻而已。在大唐文明中前往都城长安的外国人也大都来自亚洲圈内的日本、新罗、大食、波斯、天竺、狮子国。实际上，最终鼓起勇气、率先越过洲际文化界标的，是那些因海洋环境而铸造出探险性格的欧洲人。当然，在此之前的公元9世纪，中国的近邻阿拉伯人已凭借地理之便，捷足先登，在饱览了中国人文世俗之后就进行了简单的比较：

……中国的城市是用木材和藤条建造房屋，这种藤条可以编制用具，正如我们用破开的芦苇编造东西一样。房屋建成后，还要涂上灰泥和油料。这种蓖麻籽榨成的油剂，一涂到墙上，就像乳汁一样，闪着洁白而晶莹的光泽，实在令人叹服……

中国人房屋的墙壁是木头的。印度人盖房用石头、石灰、砖头和泥土。在中国有时也用这些东西盖房……

中国皇帝和各主要都市总督及官宦的文书，是由驿站的骡子来传递的。这种骡子同我们的骡子一样，截短了尾巴，在驿站规定的路线上奔驰着。这里有许多驮兽，但没有阿拉伯马，而是别种的马，毛驴和双峰驼也很多。^①

也许阿拉伯距离中国太近，以至它对异国习俗只是作些皮毛比较、徒然兴叹而已。很长时间以后，意大利的马可·波罗(1254—1324)迈出了更坚实的步伐。他于13世纪来到中国，逗留了17年。《马可·波罗游记》不仅对中国和西方做了更多、更深刻的比较，而且表现出一种更深邃、更殷切的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情怀。他拿古代中国和欧洲中世纪文明相比，显示出当时的中国文化和社会在世界上已占有领先地位。他对中国都城的大道、巍峨的宫殿、四通八达的驿站叹为观止，并情不自禁地进行了平行对比：

……他国皇帝、王公，皆无此财力，以辩是也。合全国驿站计之，备马有三十万匹，专为钦使所用，驿站大房屋，有一万余所，皆设备艳丽，其华靡情景，诗人难以笔述也。^②

马可·波罗讲述了中国皇宫的雄奇宏大，称其为“世界之最”。在描绘了大都的宏伟之后，他慨叹道，欧洲的都市缺乏统一规划而任其发展，街道之宽窄曲折均无规律，中国的都城是专制帝王以其威力营造，强迫人民迁徙，为四海观瞻，所以建得宏伟壮观，为欧洲人所不能。

马可·波罗的探险直接影响了哥伦布、达·迦马等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据说，哥伦

① 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15、17、23、1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② 《马可·波罗游记》，卷二，76章，转引自吕超：《外国人的中国观》，28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